

非
常
事
件
手
册

紧急状态

周吉海·周文革



247046

紧急状态

[南非]理查德·里夫著

侯焕良 卢明华 尧雨译



200198730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出版说明

理查德·里夫是南非的著名作家，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开普敦，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开普敦大学，获得文学士学位，随后在休厄特师范学校教书。一九六二年以后，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，他到过非洲和欧洲的不少国家。七十年代，理查德·里夫在开普敦“有色人”高等学校里教授英语和拉丁语。

理查德·里夫是在大学里开始写小说的，以写短篇小说闻名。他最早的作品都发表在南非的几种杂志上，获得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。一九六三年他的短篇小说集《非洲之歌》出版。同年，他编选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四人集》。一九六四年，他又编选出版了一本《现代非洲散文集》，主要供学校师生阅读。一九六四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紧急状态》在英国伦敦出版，一九七〇年在美国纽约重印。

《紧急状态》是一部抨击南非种族歧视的优秀作品，写的是南非“有色人”知识分子在反对种族主义斗争中所起的作用。小说通过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“三天的事件”，描述了南非有色人同殖民当局所作的斗争。这“三天”就是种族主义者对沙佩维尔和兰加两地居民反对《通

DA24117

行证法》的和平示威进行血腥镇压的后三天，同时又是全国宣布“紧急状态”的前两天。这部作品着重描述了安德鲁和阿贝这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，揭示了实干家和空谈家不同思想的冲突，反映了“有色人”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复杂过程。安德鲁和阿贝都是“有色人”，从同一所中学毕业，又在同一所大学念书，但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，安德鲁积极地参加了实际行动，阿贝却陷入了“纯理论”的泥坑。结果，前者成了一名坚定的斗士，后者竟走上了逃亡的道路。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不断回忆和联想，比较广泛地记述了南非种族歧视的实际情况。作品中，人物形象比较鲜明，语言洗练，故事情节也很动人。

序　　言

这部小说所叙述的事件，发生在开普敦及其近郊，时间是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。我在导言里简单地介绍了故事的梗概。其开头是泛非大会作出决定，于三月二十一日进行一次反对《通行证法》的宣传运动；结尾是在沙佩维尔和兰加两地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屠杀以后，南非当局宣布紧急状态。就我所知，专为纪念南非历史上这一伟大时期而写的作品，连一本都没有。因此，我不得不从当时的报纸上搜集一些材料，作为依据。我撰写的时候，力求符合史实。三月三十日以后的事，虽然重要，却不在本书范围之内。对我来说，宣布紧急状态是一种机遇，我可以借此集中注意力来观察某些特定的人物。

导　　言

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，星期五，孟加里索·罗伯特·索布克佛正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记者招待会。他是维特瓦德斯兰德大学语言学系的年轻助教，又是泛非大会的主席。他沉着地拟定了计划，来进行反对《通行证法》的运动。这次运动预定在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开始，要求在进行时不屈不挠、遵守纪律、不使用暴力。在运动过程中宣布总罢工，号召非洲人不带通行证，并且在警察分局前面，由地区泛非领袖把群众集合起来，高喊“我们没有通行证，我们再也不随身携带通行证了。千百万同胞由于违反《通行证法》被捕了，把我们也一起逮捕吧！”按照规定，运动要继续到提出的条件完全得到满足为止。

泛非大会建议非洲人国民大会（前者有一个时期脱离了后者）和自由党“参加运动，创造历史”。后来，泛非大会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，把运动开始的时间通知他，并且请他协助防止暴力行为。他们印了传单，上面写着：“如果看见路上哪一个行人因没有通行证而被捕，那就请立刻停下来，告诉警察：‘你们也没有通行证。要求把你们全体都逮捕，并且送到监狱去。’同时要喊这样的口号：‘我们不付保

证金，不付罚金，到法庭上不要辩护”。力争在运动的第一阶段，全体入狱。”

天亮了，星期一已经来到。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，要看：泛非大会的领袖们是否把自己的通行证放在家里不带出来，会不会要求把他们自己也逮捕起来，运动将得到什么样的支持。早上六点钟，索布克佛和包括恩德茨巴、恩根达耐和尼奥阿斯在内的其他领袖以及六十个信徒，闯入奥尔兰多警察分局，宣布自己没有通行证。不久，他们都给抓了起来，晚上就进了监狱。

在德兰士瓦省的波费朗区，谁也不去上班。人们聚集在警察局周围，警察叫他们散开，于是引起了冲突。起初警察用粗木棍和枪柄打人，后来扔出了催泪弹。人群被驱散以后，路上留下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尸体。三辆装甲车开进了波费朗区，空中有四架轰炸机隆隆盘旋。韦雷尼京开始了总罢工。依斯科尔被迫停止一切活动。埃瓦顿没有人干活了。伊丽莎白港，“萨拉森”式装甲车在新布赖顿区巡逻。

沙佩维尔警察分局前面的广场，如同战场一样。打死六十九人，其中有八个妇女和十个孩子，打伤一百八十人，其中有三十一个妇女和十九个孩子。受伤的人太多了，急救车来不及运，韦雷尼京医院里已经容纳不下。有些伤员只好放在大门口的草地上包扎伤口。目击者说警察在障碍物后面放枪。而警察则为自己辩护，说是有人向他们扔石块，他们才开了枪。妇女们双手掩着脸，因亲人死亡而号啕大哭。出事的消息传遍全城，沙佩维尔沸腾了。又有几辆装

甲车开了进来。

离此一千英里的地方，在开普敦附近的尼扬加区，早晨六点钟，游行开始。队伍走了三英里，来到菲力培警察分局。代表们宣布自己身上没有通行证，要求逮捕。这些人的名字被记了下来。警察说，下星期二要他们在韦恩伯格地方法庭受审，可是谁也没有被捕。

在附近的兰加区，工人们并没有游行争取逮捕。可是在单身汉公寓门前，清早就聚集了一大群人。六点钟，将近六千人响应泛非大会的号召，要求召开群众大会。按照《暴乱集会法》，群众大会是被禁止的。警察用粗木棍驱赶人群，还开了枪。三个非洲人被打死。其余的人进行了抵抗，把石块掷到警察身上，并且放火烧着了几幢房子。劳工局、行政机关、图书馆、市场和学校，都淹没在一片火海中。可以听见什么地方的阵阵机关枪声。军队已开来增援。

当天晚上，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声明，反对警察的暴行，同时还谴责了泛非大会的未经周密考虑的行动。声明说，这种行动只会带来危害，并且降低斗争效果，国民大会认为不能号召大家参加这次运动。

整个星期内，到处都有熊熊烈火，警察盯住游行队伍，又开枪，又抓人。非洲人都不上班。伊丽莎白港的警察，在装甲车的掩护下，清除了路障。如果发现有几个非洲人聚在一起，就把他们驱散。

在沃尔马区，有一百多非洲人围着篝火又唱又跳，把自己的通行证烧掉。全球报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南非来

了。从世界各地发来了抗议书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，星期四，全国上下都在搜捕政治嫌疑犯，不管他是否参加了泛非大会的运动。警察根据《刑法修改法》和《暴乱集会法》，手持拘票，寻找嫌疑分子与泛非组织成员的联系。司法部长严禁在二十三个管区内集会，不论与会者属于哪一人种。

翌日，司法部长提出以全权授予总督，让他——为了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——通过官方报纸宣布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以及其他几个组织为非法。

二千名非洲人在开普敦市卡利登广场的警察分局外面进行和平示威。他们的领袖，大学生菲利浦·戈萨那说警察不会抓他们，因为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，队伍就从容地散开了。整个南非联邦取消了警察的休假，让他们进入待命状态。开普敦的法庭上有一百零一名非洲人出庭受审。他们因检查时没有出示通行证而被捕。在帕尔区法院大楼前面，示威性地焚毁了一只口袋，里面装着几百个通行证。四个非洲人被拘留了，其中两人是妇女。区里所有的中小学都已化为灰烬。

星期六那天，全国警察得到官方的指令，说是不要逮捕未带通行证的非洲人——不论男女——直到特别指示下达为止。前任首领布土利在约翰内斯堡把自己的通行证烧了。国民大会号召大家学他的榜样，也把通行证焚毁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星期一，开普半岛有五万七千名非洲人不干活，因为两个代表大会宣布在这一天为沙佩维尔和兰

加两地的被害者举行哀悼仪式。几千名有色人或是不上班，或是早下班。北方许多自治市政府为非白种人办的中小学，由于家长们的坚决要求，几乎全部在中午以前就关门。开普敦港口实际上已陷入瘫痪状态。屠宰场的有色人和非洲人都罢工了，牛奶不送了，建筑工程停顿了。

在德班，派纳敦附近的克勒芒特，死了一个非洲人，伤了几个人。在伍斯特城郊的居民区“希望之乡”，烧掉了五座教堂、一间学校诊疗所、几个行政机关以及非洲人警察的住所。开普省的斯德伦伯赫市卡雅曼底区的行政机关也给烧光了。

在兰加，五万人——各色人种的代表——参加了三个被枪杀者的殡葬仪式。一队神情忧郁的非洲人默默地扛着棺材。在开普敦的第六街区及其四周，发生了六起放火事件。在市场大街，人们用汽油浇在汽车上，然后点上了火。在大阅兵场的人群中，三个有色人被捕了。

整个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向当局示威，烧了通行证，要求把自己也抓去。局势愈来愈紧张了。

第一部分

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星期一。

下午五点半光景，在开普敦的大阅兵场上，几个水果摊附近，集合了一千多人，其中大半是有色人。

警察说他们违反了严禁集会的法令，叫他们散开。这些人不肯，因而挨了揍。

等警察一走，大阅兵场上又是人山人海，并且在仁爱大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队伍，把石块扔向驶过的公共汽车和小汽车。可是过不多久，警察又出现了。这一次，他们头戴钢盔，手持步枪，还扔出了催泪弹。

1

安德鲁·德雷尔迅速穿过大阅兵场，钻到水果摊与水果摊之间的夹道里，使劲往火车站跑。跑着跑着，他改变了主意，一下子跳进了马路拐角的男厕所。他张着嘴巴喘气，胸口似乎堵着一个充满了气的球，领带卡住了脖子，两脚象铁锤一般拖不动……真见鬼！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呀！他突然又想到，后面可能有警察跟踪。这时，他才明白自己多么

愚蠢。到了厕所里，就再也逃不出来了。落网了！好比耗子钻进了笼子！他听到从楼梯上面往下走的脚步声，就象一头遭到猎捕的动物，张皇四顾；他往镜子里看了一眼，头发乱蓬蓬的，黝黑的脸不象样了，鼻翼不断扇动。天哪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！有两个人进来了，原来是一个年轻人搀着一位年老的穆斯林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老头儿吓着了，直打哆嗦，没有牙齿的嘴巴嘟嘟囔囔的。小伙子用柔软的手帕给老人擦了擦额头，安慰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进来一批人，其中有三个妇女。他们都惊慌失措、歇斯底里，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广场上发生的事情。安德鲁总是记着市场上那个售货员。在搏斗开始之前，这个身穿肮脏白大褂的人，一面把水果送给警察，一面逗着人们笑，可是忽然丢下售货车，沿着克波雷兴大街拼命跑。他挨了一闷棍，摇晃了一下，吃力地站住了，脸上、衣服上都是血。接着他又往远处跑去，中途掉了一只皮鞋。不知他是怎样跑回家的，安德鲁很担心。真奇怪，在这么紧张的时刻，他还老是想着不相干的琐事！

这一天，真是见鬼！早上，安德鲁没去参加校际体育比赛，而和阿贝一起去给兰加的被害者送葬。那里的入口处没有哨兵，没有人要他出示通行证。哨舍只剩下一堆烧糊的木板。悲伤的非洲人以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们这两个不相识的有色人。

葬礼完毕，安德鲁搭阿贝的汽车一起回到开普敦；此后，两人不知怎么失去了联系。警察袭击的头两次，他们都

没遇着，只看到向四面八方逃散的人们。可是第三次袭击时，安德鲁却在火力最密集的地方……他竭力想忘掉那些事，偏偏记得清清楚楚：到处都在传达命令啦，警察队长的奇怪表情啦，大雷雨即将来临啦，等等。还有，小贩异乎寻常地叫喊：“香蕉，先生，”“一个先令买六个，”“请买香蕉，先生，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见人撞人的一片混乱，而且听到凄惨的哭声。一个妇女绊了一下，倒在地上。一个报童双手捂住正在流血的头，赶快逃走。安德鲁呢，不假思索地奔向一个夹道，躲开警察和人群，来到了这里。

这时候，厕所已经挤得满满的，有的已被推到那些小间的门边，有的坐在洗脸池上，有的站在台阶上。墙上贴着一张条子：“请上前一步小便”。这里的空气坏极了，又臭又潮，叫人憋闷。有个妇女大声发笑，可是立刻被四面八方的嘘声制止了。安德鲁奔到街上，心想即使挨警察的木棍，也比呆在这里强。不管是乘车到青草公园回家，还是到露丝的公寓去，只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好。可是走出厕所，要是让警察发现，他们这些人都得一个个被捕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浑身痒痒，汗流浃背。不，不，他应该离开这儿。安德鲁从楼梯上的人群中往上挤，到了上面，小心翼翼地朝街上看。空气中还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刺鼻味儿。他在下面呆了多久啦？二十分钟？还是二十五分钟？大阅兵场上空荡荡的，一个警察也没有。到处是纸片、丢失的鞋、打碎的瓶子，还有一个玩具娃娃。

“好了！”安德鲁向下面喊，“没事，你们可以出来啦！”他把上衣纽扣扣上，把领带拉拉整齐，便朝着车站的方向大步走去。

2

车站挤满了人。四周的警察手按枪套，沉着脸，盯着人们。气氛是紧张而敌视的。安德鲁走到专为非白种人设的售票口，买了一张到普拉姆斯蒂德站的车票。到了那个站，他将换乘公共汽车到青草公园。回家以后，他要洗个澡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去找露丝。阿贝不知怎样了？他是否来得及逃脱警察的追捕，坐上自己的汽车？应该打个电话去问问。月台上，人们转来转去，大声地议论着示威、葬礼、罢工的事。安德鲁听到了这种声音，可是没心思细听，只想快点回家。是不是先乘车去看露丝？不，最好还是在心情稳定下来以后再去见她。就这样办！

火车来了，人们潮水般地拥上前去，而年轻的白人警官把大家往后推。这里有抱怨声、恫吓声。警察把手枪套子解开，死死盯住他们。难道要重演一遍吗？安德鲁不禁颤抖起来，天哪！别再那样了！天哪！别再那样了！

他进了车厢，在靠窗的一个位子坐下。邻座的妇女在描述大阅兵场上的事，看来是个爱说话的人。她在那里丢了手提包，因此责怪政府。这使安德鲁想起了房东卡罗利森太太。也是这样瘦削的农民的脸，也是这样沙哑乏味的声

调。这房东太太是不错的。她虽然怀着一种庸俗的偏见，自称为“值得尊敬的有色人太太”，大概还不太坏。总之，他很可能碰到比她坏得多的人。

他生气的只是，她称他为“德先生”。“德先生，您有那么多书，难道每本都读吗？”她总是用英语说话，但是非洲口音很重。“想必您买书花了不少钱吧？可是，我们有色人，在学习上是不能吝惜钱的，如果我们想得到点什么的话。”

不用说，她真是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女人。做姑娘时，她叫米利·艾里丝，或者叫米利森特·艾里丝。她很机灵，命运也好，嫁给一个社会地位不低的婆家，于是她就成了米利森特·卡罗利森太太。她所管辖的，不仅是那不出色的、不中用的丈夫和五个孩子，还有安德鲁。想起了她，安德鲁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笑容。她穿戴得太讲究，香粉扑得太多，太装模作样。她是本地荷兰改革派教会的重要人物，让丈夫去当乡间小教区的头头。除了忙忙碌碌，这职位对他没什么好处，可是使她的身价提高了。她的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过摆满了粗笨的家具，墙上有几个镜框，里面装着她的（不是他的）祖先的大幅照片。走廊里挂了两幅复制画，一幅是基督双手捧着一颗流血的心，另一幅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。卡罗利森太太对丈夫和四个儿子管得很严，却非常宠爱独生女儿查梅因。这姑娘弹起钢琴来，使安德鲁心烦。他知道女主人是不欢迎他的，可是很需要他付给她的膳宿费。况且重要的是，在她家里住着一位中学教员——有一定社会

地位的人。安德鲁明白，等到她的大儿子埃尔德雷德拿到中学毕业文凭以后，他们就会叫他搬走的。每家有一个教师就够了。还有，对于他的政治活动，她到底有什么看法呢？显然，她什么都琢磨过，只是没表态而已。也许危急时刻是可以信赖她的。无论如何，二十四号那天早上她没打扮。那是星期几？五天以前，星期日，星期六，星期五，星期四，星期五还是星期四？当然是星期四。那一天，他和露丝见了最后一面，讲了关于搜捕的事。同白人姑娘交往，应该始终存着戒心，然而露丝不同。是的，那是星期四早上五点钟，卡罗利森太太轻轻地敲门。

“德先生！”

安德鲁因为被她叫醒，很不满意，翻了一个身，把枕头拉拉好。

“德先生，您醒了吧？”

真见鬼！纠缠不清。他摸到电灯开关，开了灯。突然的亮光晃得眼睛直眨。

“您醒了吧？德先生！”

“醒了，什么事？”

“警察找您来了。”

他的睡意一下子就消失了。这么大清早，他们究竟要干什么！该死！恐怕是特别政治部的。他的书都在书架上，小册子在书包里，应该小心点。最糟糕的是，他身边还有政治会议的记录。

“现在他们在哪儿？”

“在客厅里，要立刻见您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等一等！”安德鲁说，同时把门锁上。

他穿上衣服，用脚去找拖鞋，两眼扫过架上书籍的名称：《现代墨西哥画家》、《在非洲》、《向西北航行》、《解析几何第二册》等等。行！这些书不要紧，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藏起来的东西。这些警察来干什么呢？他把门打开一看，卡罗利森太太正在走廊里发愣。

“放心吧，没什么事。”他悄悄地说。“睡觉去吧，顺便请把我的公事包拿到您的卧房去。”

她竟那样顺从，使安德鲁感到意外，可是没有时间多想。当他走进客厅的时候，她点了点头，表示她会照办。落地长窗旁边站着两个便衣侦探，一个是白人，另一个是有色人。他认得后者叫塞普忒姆勃。

“侦探布利根豪特中士，特别政治部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爱理不理地回答。

“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？”

“就在天亮以前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请坐。”他故作镇静地指指靠椅。

“现在让我核对一下……您姓德雷尔，叫安德鲁·德雷尔，是吗？”警察问他时，手里拿着一张名单，同时又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。塞普忒姆勃在门口站岗。

“是。”

“您住在这里吗？”